

# 裁军谈判会议

CD/FV.306  
4 April 1985  
CHINESE  
Original:ENGLISH

---

第三百零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5年4月4日星期四上午

10点30分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K·维达斯先生（南斯拉夫）

##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B · 奥尔—罗伊斯先生

A · 贝莱德先生

H · 拉贝希先生

阿根廷

R ·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澳大利亚

R · 布特勒先生

R · 劳先生

J · 库尔特尼女士

S · 弗里曼女士

比利时

M · 德帕斯先生

巴西

C · A ·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S ·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K · 特拉洛夫先生

V · 鲍日洛夫先生

H · 哈拉切夫先生

R · 达扬诺夫先生

P · 波普切夫先生

N · 米哈伊洛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

吴拉敏

加拿大

J · A · 比斯利先生

R · 罗尚先生

中国

钱嘉东先生

王止芸女士

出席者名单

刘钟仁先生

石继成先生

石锦坤先生

林成先生

潘菊生先生

于中洲先生

李本松先生

古巴

C · 莱丘加 · 埃维亚先生

P · 努涅斯 · 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 · 维沃达先生

A · 齐马先生

J · 巴伊加尔

埃及

A · M · 巴德尔先生

F · 穆尼卜先生

埃塞俄比亚

F ·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F · 德拉戈尔斯先生

H · 雷尼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 罗泽先生

W · 克鲁茨施先生

L · 米勒先生

F · 扎伊阿茨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 · 韦格纳先生

M · 格德茨先生

W - N · 格尔曼先生

## 出席者名单

匈牙利

F · 加伊达先生

T · 托特先生

印度

M · 杜贝先生

S · 肯特·沙尔马先生

J · 普拉萨德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F · 卡西姆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N · K · 卡米亚布先生

F · S · 锡尔詹尼先生

意大利

M · 阿莱希先生

F · 皮阿杰西先生

M · 帕韦塞先生

R · 迪·卡洛先生

日本

今井隆吉先生

川喜田晖雄先生

佐藤昌世先生

石栗勉先生

秋山一郎先生

肯尼亚

P · N ·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P · 马塞多·里瓦先生

蒙古

S - O ·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O · 希拉莱先生

荷兰

R · W · 范斯海克先生

## 出席者名单

尼日利亚

R. J. 阿克曼先生

J. 拉马凯尔先生

O. O. 乔治先生

C. V. 乌德迪比亚先生

巴基斯坦

M. 阿赫迈德先生

秘 鲁

J. 冈萨雷斯·特罗内斯先生

波 兰

S. 图尔班斯基先生

J. 恰洛维奇先生

J. 雷赫拉克先生

罗马尼亚

P. 巴洛伊乌先生

A. 波佩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J. 达纳帕拉先生

P.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 典

R. 厄克于斯先生

L-E. 温伦先生

E. 博妮尔夫人

H. 伯格伦德先生

A. M. 劳夫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L.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A. M. 什马托夫先生

L. A. 纳乌莫夫先生

A. N. 卡希林先生

G. V.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出席者名单

I · N · 谢尔巴克先生

E · N · 戈洛夫科先生

A · P · 库捷波夫先生

O · V · 库兹敏先生

联合王国

R · I · T · 克罗马蒂耶先生

R · J · S · 埃迪斯先生

D · A · 斯林先生

J · F · 戈登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T · 巴塞莱米先生

H · W · 戴维森先生

D · 多恩先生

R · 斯科特先生

L · 贝尔加德先生

K · 克里顿伯格女士

P · 加德纳先生

R · 米库拉克先生

B · 莫顿先生

委内瑞拉

E · 特霍斯特先生

O · 加西亚先生

南斯拉夫

K · 维达斯先生

M ·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M · 斯特耶潘诺维奇女士

D · 米尼奇先生

扎伊尔

蒙什恩武拉 · 翁武安内先生

出席者名单

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  
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  
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  
组主席

O·达赫尔曼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M·科玛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维沃达)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06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本会议今天继续审题为“化学武器”的议程项目4。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规定，任何成员均可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

根据本周举行会议的时间表，本会议今天应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审议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我们收到了一个非成员国要求参加本会议工作的申请。秘书处今天已将该申请散发，我们要在非正式会议上进行讨论。你们还会记得，若干已被邀请参加我们工作的非成员国当时表示，如果这一刚刚成立的关于议程项目5的特设委员会得以设立，他们将极感兴趣地注意该委员会的工作情况。秘书处将提供有关的决定草案以便立即进行审议。

今天我们还将讨论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

审议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还将介绍该小组的进度报告已载于第CD/583号文件。我希望，愿就该报告提出意见的成员要尽早这样做，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该报告建议的关于特设小组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即1985年7月15日至19日。我打算在4月11日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向大会提出该建议。

今天在名单上登记发言的有捷克斯洛伐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印度和加拿大的代表。登记发言的还有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的代表。

我现在请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维沃达大使发言。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我欢迎你作为来自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代表担任裁军谈判会议春季会议最后一个月的主席，我国与贵国多年来一直保持兄弟般的友好关系。我祝你能够顺利地解决有待解决的组织安排问题。作为本月份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协调员，我要向你保证社会主义国家一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你的前任委内瑞拉的塔伊尔阿达特大使已经离开了日内瓦，但是我们会记得他的出色工作，使我们能够在他的任职期间设立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

外层空间非军事化的问题正是我今天要谈的项目。同前面的发言者一样，我还愿强调我们给予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该问题确实是裁军谈判的中心问题，



## ( 维沃达 )

得到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的充分肯定。因此，我们欢迎这样一个事实，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已被列入几星期前在此开始的苏美双边谈判的议程。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由如下事实所决定的：即导致外层空间能够摧毁外空和地面各种目标的武器达到饱和的各种太空武器系统这一真正危险近年来有了急剧增加。

自从该项目一列入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我们就支持会议应开始就将有效地防止军备竞赛扩展到太空的具体措施进行谈判的主张。由于这一原因，我们过去一贯支持并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提议设立一个具有适当谈判权限的特设委员会。我们仍然认为，具有这种权限的附属机构能够最有效地解决刚刚谈到的问题。

上星期五，我们终于设立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 21 国集团并不认为给予该委员会的权限令人十分满意。但是，为了探索一切可能向前发展的机会，这两个集团又一次表现了积极和灵活的态度。我们希望，如果所有代表团表现了同样的态度，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就可以取得一些积极成果。

特设委员会工作的具体内容和计划当然需要经全体参加者一致同意。看来很明显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继续我们在全体会议上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那种活动方式。确实，看一看记录人们可以发现，很多发言都对现有条约进行了评价，认为它们对军备竞赛扩展到太空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对这些条约有哪些积极方面已取得大体一致的看法。大家也指出了存在的漏洞。我们感到可喜的是，实际上所有发言都同意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必要性。

我们不会认为已通过的权限只是简单地要求我们抽象地指出现有文件还没有包括的东西。那怕初步地检查一下，什么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最恰当的解决办法也将是适宜的。我可以用禁止对空间和从空间对地面的目标使用武力的问题举例说明。没有一项现有条约载有全面禁止使用武力的条款，而我们以及其他成员都认为这是很必要的。那么我们应该只限于发现这一事实吗？根据现有条约，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查什么是最好的方法来更好地有效禁止在有关领域使用武力。

根据已通过的权限，特设委员会应对有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现有建议给予应有的重视。因此，我国代表团愿强调我们对苏联关于禁止在外空和从空间对地面使用武力的条约草案的重视，该草案已提交联合国大会第 39 届会议，并在去年作为

(维沃达)

第CD/476号文件提交裁军谈判会议。条约草案的条款对在外空和从空间对地面使用武力的问题提出了可行的和全面的解决办法。它建议禁止在大气层或外空试验、部署或使用摧毁地面物体的任何空基武器，并不得干扰其他国家的空间物体。它还包括不得试验和制造新的反卫星系统并摧毁任何现有的反卫星系统，以及不得试验或使用由人操作的用于军事、包括反卫星目的的航天飞行器等条款。

某些国家，如法国也提出了一些建立信任的措施。我国代表团很愿意在特设委员会讨论这些建议。但我们认为，每个领域中的建立信任措施应有助于有关的法律文书。这样，在我们进而就外空方面可能达成的新协议展开更周密的讨论时，才有可能对建立信任问题进行更具体的审议。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应尽早开始进行实质性工作。我们很难期望在春季会议期间取得多大成果。但至少委员会工作的组织基础应建立起来，以便我们到了夏季不需要再在程序问题上浪费很多时间。

在防止外空军事化的努力方面，时间确实是决定因素。鉴于太空技术的飞速发展，很可能几年以后我们谈论的将不是防止而是停止外空军备竞赛的问题。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优先项目之一不会发生这种改变。很多代表团表示了对所谓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的严重关切。我们对此也非常关切。我愿强调指出，在军备扩充方面，我们不靠宣布的意图、更不靠对事实的任意歪曲来评价事态的发展。相反，我们客观地评价其可能的后果。洛维茨大使在3月19日的发言中竭力使我们相信，“战略防御计划”不仅不会给国际安全带来损害，而且会对彻底消除所有地方核武器的目标作出贡献。然而，我们不能凭任何想象就同意这种结论。问题是我们并非从“打开创造性的阀门”这一角度、而是从真正的现实并与美国进攻潜力的整个武装力量联系起来看待战略防御计划。

法国国防部长夏尔·埃尔尼在慕尼黑的国防讨论会上说，“最大的可能性仍然是：防御系统的部署将会重新开始一场进攻性的军备竞赛”。美国对自己的防御计划“反应”极为迅速。它不仅正在依靠现有进攻武器，而且正在制造诸如MX导弹、三叉戟II型和巡航导弹这种具有高度准确打击力的新进攻武器。更新和更具穿透力的防御武器已在计划之中。美国还将大幅度增加资金以实现所谓高级战略导弹系

( 维沃达 )

统计划。其目的就是通过使用先进的诱惑器、不规则行进弹头和其它装置来使美国的核导弹无法防御。该计划充分证明了很多军事专家的结论，即在防御系统得到发展的同时，进攻系统也将得到发展，以对付前者。美国还定期增加资金以发展这些新的、更具有穿透力的进攻性武器。本财政年度这些资金已达到九千八百万美元，明年将达到一亿七千四百万美元，再下一年将达到二亿一千六百万美元。增加的大部分费用将用于高级的“穿透辅助设备”，帮助美国导弹命中其目标。无论所宣布的意图如何，只能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人们不可能在建立防御系统的同时期待削减进攻性武器。

“战略防御计划”通常被称为“星球大战”的概念，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尽管它可以起到某些防御作用，其主要作用和后果是侵略性的。这种做法的真正危险是，尽管“战略防御计划”不能被认为是对付大规模第一次打击的有效手段，然而会造成有可能防御报复性打击的错觉。因此，五角大楼的军事专家也一定会意识到这一点，即导弹防御将最有可能鼓励第一次打击的战略方针。

尽管把数十亿美元投入“战略防御计划”，美国官员却不断宣称这只限于研究。然而人们一定很想知道进行这项研究的始末。战略防御的想法并不是在1983年3月提出的。根据洛基特达因负责高级计划副总裁R. D. 帕斯特的说法，“洛基特达因十年来一直参与了这方面的技术”。人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加速努力研制和应用不仅得到研究而且得到试验的激光和其它直接能源武器的问题。1983年5月和6月，美国空军试验了一种激光武器。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试验场，这种装载一架C-135飞机上的激光武器，成功地摧毁了五枚响尾蛇防空导弹的导航系统。去年6月10日，在太平洋上空160公里高度，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弹头第一次受到一枚导弹的截击。难道这一试验与“战略防御计划”之类的计划没有关系吗？

为了替“战略防御计划”的必要性进行辩护，美国官员争辩说，苏联在把大量资源用于其防御计划。但是众所周知，美国的这种估计通常是过高的，就象三叉戟II型和巡航导弹是为了克服所谓“脆弱窗口”的情况一样，这是连美国的权威人士也确认的。了解一下，为了替“战略防御计划”的必要性进行辩护，这种“美国制造的过高估计到了什么程度，将是很有意思的。

(维沃达，主席，伊斯拉耶利安)

这一计划还有其他很多令人不安的方面。其中之一就是不可避免的广泛深入的计算机化。防御反应最终将脱离人的控制。根据军事专家的看法，这种反应将在美国指挥官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之前便由计算机算出来，而这种反应很可能是计算机系统的一次错误。

美国国内关于“战略防御计划”的非核性已谈论很多。我们也听到了这些话。但是如人们会估计到的，如果美国的研究家得出结论：X射线激光最适用于这一系统，而其他办法是不那么适合的，这些话不就会被忘记了吗？这样，最终不会把几百枚原子弹布置在苏联和其它任何国家上空低轨道的保证又在那里呢？我们认为，最好的保证就是不去发展一种一下子就会使军事策划者们产生这种诱惑的系统。

正如在一些西方国家经常发生的一样，政治考虑和真正的安全需要不是就军事计划做出决定的唯一标准。与西方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毫无共同之处而只具有自己切身利益的军事工业联合企业，也有它的发言权。就“战略防御计划”而言，其有关代表是众所周知的。它们是：生产激光产品的罗克韦尔国际公司、TRW公司、以及波音公司；生产空基雷达的格拉曼公司；生产老式导弹截击器的马丁·玛丽埃塔公司；以及IBM和霍尼韦尔及很多其它计算机公司。所有这些公司都十分清楚，美国政府今后几年在战略防御计划上花费数百亿美元的打算将给他们带来巨大利润。他们并不关心其活动可能造成的悲剧性后果。但国际社会，以及所有现实主义的和认真负责的政治家担负不起这种“奢侈品”的。我们期待作为裁军谈判多边机构的裁军谈判会议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作出贡献。

主席：感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现在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称呼你主席同志。因为早在卡尔·马克思时代，各国的共产主义者，不论其国籍如何，彼此都以同志相称。苏联代表团怀着特别喜悦的心情，欢迎你这位友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担任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我认为，正当临近战胜法西斯主义四十周年之

(伊斯拉耶利安)

之际，由一位曾经对取得这一历史性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的代表来主持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在今天是具有深刻象征性意义的。在整个二次大战中，南斯拉夫人民和苏联人民英勇地反击了侵略者，为争取他们的自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主席同志，作为南斯拉夫反对法西斯占领，争取民族独立而英勇斗争的一名参加者，我向你深表敬意。这对我作为一名伟大卫国战争的参加者来说，感到格外高兴。祝你在履行你的重要职责时取得成功，希望在你的领导下，能推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向前发展。

今天，我们要详细地审议禁止化学武器问题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中禁止化学武器占有特殊位置。世界公众舆论期望本会议尽早解决这一问题。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裁军谈判会议的活动与化学武器谈判有愈来愈紧密的联系。谁也不会否认，近年来在这一领域做了很多工作。今年在委员会主席图尔班斯基大使的指导下开始就禁止化学武器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谈判，也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我们仍然因为谈判进展甚慢而表示关切。会谈年复一年地继续进行，但仍无实际成果，没有根本的突破。某些成员国似乎因谈判有圆满成功的可能，因公约有签署的可能而感到害怕，经常故意提出一些不能接受的，我要说是过激的建议。

然而，尽管由于某些方面的立场而出现了这些严重的复杂问题，苏联仍然相信有可能解决这一紧迫问题，并将继续做出努力，以便按照谈判各方都能接受的条件，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自签署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苏联始终不渝地遵循一条旨在拟定和签署一项彻底和永远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而不危及加入公约各国的安全、经济或任何其他利益的方针。

本会议成员国也许感兴趣的是，早在1928年，出席普遍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团就提出一项用以补充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新建议，其中特别包括以下条款：所有为化学战目的服务的手段和装置，即所有用于军事目的的窒息性气体以及用于释放这种气体的所有装置，尤其是毒气喷射、喷雾装置、气球、火焰喷射器和部队正在使用以及在兵站储存或正在生产过程中的其他装置应予销毁。此外，它还建议，生产化学武器的工业设施应立即停止生产。

假使参加谈判的其他各方当时接受了苏联的建议，化学武器早就消除了，我们

(伊斯拉耶利安)

现在也就无需就这个问题进行这样艰巨和旷日持久的讨论了。

今天阻挠化学武器谈判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呢？很明显，就是某些方面继续力图把自己的做法和他们自私的看法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完全是令人生厌的。我们确信，在寻求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寻求关键问题的解决办法时，应当铭记各方关于政治、经济和防御方面的特殊利益，也要记住各个国家和人民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一些国家和人民，就说由于外国干涉和侵略而丧失了数千万人生命的苏联吧，从严酷的历史教训中懂得对于各种要求“坦率”、“公开”、无限制核查和其他使人疑虑丛生的建议，要特别谨慎小心。同时，其他一些没有象我国人民一样经历过磨难的人主要从他们自己的宣传机器所虚构或过份夸大的狭隘多疑的“经验”出发来考虑问题。

最近在这个大厅中，有人告诉我们，我引用原话，“凡是没有隐瞒任何事物的人，都会同意具体的核查措施”。也许是这样，但条件是，要真诚地采取这些措施，而不能别有用心。但是，有鉴于我们的历史经验教训，难道我们能够相信情况永远是这样吗？

苏联建议的显著特点正是，我们不想把有损于别国安全和影响别国经济的规定强加于人。例如，让我们看一下苏联对待被准许目的的化学品问题的态度。

这种办法将使民用的商业性质的化学工业免于承受实际会扩大到每个企业的外来侵入性核查程序这种巨大负担。同时，为了公约的目的，我们不得不对化学工业的生产提出一些具体限制。我们建议限制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以及构成最大威胁几乎毫无和平用途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化学品，即甲基磷键化合物。这种限制不会对未来公约的任何缔约国造成重大损失。在这方面我们愿忆及，限制生产某些化学品不完全是异乎寻常的。众所周知。杀虫剂对人体的危害还不象剧毒致死性化学品那样严重。然而，对某些杀虫剂的生产实际上是受一定限制的。

实际上，和平的化学工业事实上是否真象某些代表团有时说的那样，非有赖于剧毒致死性化学品不可吗？鉴于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的需要，考虑在公约中写入一条允许对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和甲基磷键化合物进行这类修正的规定岂不是更明智吗？

我们认为，其他办法，特别是将核查扩大到所有化学工业的作法不切合实际，并且会严重影响各国的经济活动。

(伊斯拉耶利安)

联合王国的工作文件(第CD/514和CD/575号)进一步使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详细阅读该文件后表明,文件的起草者想要使上百种,甚至上千种化学品都受到无所不包的各种严格的监测,不仅是集中监测生产技术上最危险的阶段。这在目前是否切实可行呢?

人们会很有理由地问,哪一种对化学工业负担最小,是进行某些合理的限制呢,还是耗费资金的,意味着对国家经济和其他利益毫无好处的全盘监测呢?

要求人们非常谨慎,全面衡量和采取负责态度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消除、拆毁和转用。也许谁都会同意,毒性化学品,包括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化学品的取得,是化学工业几个生产阶段的结果,每一生产阶段都具有不同的技术装置。其中一个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或二元系统关键组份的最后技术阶段。那么从草拟公约的角度看,实际利益的目标是什么呢?应当消除整个设施呢,还是只消除负责最后技术阶段那一部分更合适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某些谈判方面不愿容纳别人的立场,想强行实施自己的片面作法,这是谈判中没有完全解决销毁化学武器储存问题的原因。我们认为,在这里要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商定一个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程序,这种程序在销毁的任何阶段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单方面的军事利益。我们准备审议谈判中提出的各种提案,包括一个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危险性大些和小些的武器储存交替销毁的提案,从而考虑这样的因素:随着储存的销毁,相互信任的提高,在此期间为对缔约国或非缔约国可能违反公约作出适当反映应予保证的能力。

在多年的国际谈判史中,所有的会谈伙伴,总是首先确定一致的基线和标准,然后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定义。禁止化学武器会谈的情况也如此。目前已根据客观因素,以最大的精确度确定了毒性标准,已确定了关键前体的初步定义,并已为未来公约的某些其他条款做了不少工作。经过多年艰苦的谈判努力之后,有人现在却建议我们放弃客观标准,代之以纯粹主观的分类,例如关于各种化学品所具“危险”程度的概念。我重复一遍,这是一种主观思想。这就是说,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因此,要在这样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就肯定会十分困难。这种办法实际上把关键前体的问题本末倒置。我们坚决相信,首先要做的是确定标准,并就标准达成一致意见,只有到那时才能基于这一标准制定一个关键前

( 伊斯拉耶利安 )

体的清单。我们认为，技术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已经有了，现在应当把它写下来，作为未来公约的一项条款草案。

这将打开拟订关键前体清单的道路。关于某些前体可能不符合所有已确定的标准这种论断是经不起批评的。我们认为，确有必要时，超出一般规则的例外情况可以根据公约另行处理。最近，有人作为一个重大“让步”向我们提出了一种“新”办法，就是拟定清单的同时制定标准。这样做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只要清单上增加一个关键前体，就会产生标准问题。因此，应当事先确定标准，并达成一致意见。

能够用于生产二元化学武器的关键前体问题当然是另一个问题。苏联代表团建议，为了公约的目的，应当把这种关键前体叫作二元化学系统的关键组份，因为根据二元系统的特殊热动力学的要求，不是所有关键前体都适合这种作用的。

出席会谈的某些代表团建议，对同一种化学品本身规定完全不同的制度。用于防护目的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只能在最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在小规模专门设施内生产，每年最多生产一吨，但用于其他准许目的的这种化学品，却允许在任何地方，不限数量地生产。基于这种建议的公约，一方面消除目前生产化学武器的工业基础，但同时可能最终为建立新的，更先进和更复杂的基础创造先决条件。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保证不生产化学武器的双重标准。绝不允许这样做。苏联代表团认为，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研究一下芬兰关于小规模设施的合理提法的建议有好处。

我们认真考虑了其他代表团提出的旨在找到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提案。这特别是指法国关于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生产、设施分类并确定其相应制度和解决二元武器问题的提案，以及中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的提案。

主席同志，为质疑性视察详细制定原则和作出安排以澄清不明确的情况一向是，而且仍然是最艰巨的任务。谁也没有象美国代表团试图表明的那样提出，除非证明有违约行为，否则不应进行质疑性视察。至少这不是我们的立场。我们认为，质疑性视察要求各国有一种特殊的责任感和政治现实主义的态度。必须懂得，公约的遵守主要有赖于公约各缔约国的美好意愿，有赖于它们抱着一个减轻军备竞赛负担的和平世界的希望，并有赖于它们要消除发动化学战争的手段本身的愿望。公约还有赖于通常高度重视政治声誉的国家不要让自己的过错损害自己的声誉。



(伊斯拉耶利安)

这是有助于我们在公约中适当地提出质疑性视察并正确制定有关条款，而不损害这种视察目的，或破坏国家主权的唯一方法。华盛顿应当清楚地懂得，努力使质疑性视察变成强制性的和自动的，只能浪费我们制定公约的时间。对于这种建议，我们毫不含糊地持否定态度。

因此，我愿说明下列原则问题，这些原则不仅限于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方面。大家都知道，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指出，在任何一项协议中提出的核查方式和条件，均依赖于该协议的宗旨、范围和性质。将其引入正在草拟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这明显地意味着关于核查的方式和条件必须明确确定：公约是否正得到遵守，同时是否没有超出公约的范围。因此，我们不得不反对可能用于公约以外其他目的的核查方式。

禁止化学武器绝不要求为进入下列设施提供方便，即所生产的武器类型不受有关协议影响的设施。因此，理所当然的是，如果我们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禁止化学武器的任务，那么就必須拟定那种核查程序，即不能被乱用来干涉未参加禁止某种特定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公约的国家的活动。

我们一再强调，只有到全面彻底裁军阶段，才能讨论全面彻底核查问题。企图把全面彻底核查硬塞进一项部分禁止某一具体，但却是重要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即化学武器——的协定，作为该协定的一部分，就等于在达成协议的道路上设置人为的障碍。

最后，我愿重申，苏联代表团随时准备继续进行认真和建设性的谈判，以便尽早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众所周知，我们和其他代表团都提出了要求更合理地利用我们谈判时间的建议。我们坚决执行谈判会议上届会议作出的定于1985年秋展期召开禁止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会议的决定。

就苏联而言，禁止化学武器一贯而且仍然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最重要的文件中确定的优先任务。苏联代表团将竭尽全力尽快完成这一任务。

主席：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

我现在请印度代表杜贝大使发言。

(杜贝)

杜贝先生(印度)：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看到你主持裁军谈判会议四月份的工作我国代表团感到由衷的喜悦。南斯拉夫与印度在国际礼让往来方面一直享有最亲密和最友好的关系。由于我们积极地参与并坚定地拥护不结盟运动的目标，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加强，并开辟了很多新的领域。不结盟运动一贯高度重视裁军的目标，特别重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制止核军备竞赛的紧迫任务。南斯拉夫对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和目标、包括裁军的原则和目标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我们期望，裁军谈判会议在您的引导下，能够在本月份的工作中取得重大进展。我们非常信任你作为一个外交家具有的出色能力以及在多边谈判中的长期和丰富的经验。我愿向你保证印度代表团在你履行自己崇高职责期间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

我还愿借此机会向您的前任委内瑞拉的塔伊尔阿达特大使所做的工作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真诚赞赏。对他成功地主持会议的最好赞扬莫过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他的结束发言，会议将作出决定，第一次设立一个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

今天我将专门谈一谈本会议的议程项目3，即防止核战争。在过去几星期内，代表们已就这一项目作了不少重要发言。对于其中一些、特别是尊敬的西方国家代表的发言，发言者在表达他们政府对这一关键问题的观点时所表现的坦率，很值得我们赞赏。至于说我们不同意这些一般地重申他们过去僵硬立场的观点，则是另外一回事。例如，我们有一次听到他们说重视保证其国家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核威慑理论。我们还听到了关于防止核战争的问题不能够与防止一般战争分开来讨论的说法。

尽管最近出现了一些极为有意义的事态发展，然而这些代表所提出的这些和其它论点仍然没有改变。这些事态发展是：包括这些国家政府在内的对核冬天调查结论的一致同意，以及其中一些国家最高决策阶层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承认，即建立在进攻性核武器基础之上的威慑既不可行也不可取，因此需要补充或代之以发展防御性武器。另外一个不安的事实是：在提出这些论点的同时，为避免灭绝人类威胁而采取紧急有效行动的问题，总的来说，仍然没有得到注意。

由于当今作为世界末日机器的核武库的基本特点与核武库拥有者所错误地认为的用途，即维持人们称为“稳定的和平与国际安全”的手段之间的不协调，使整个

(杜贝)

问题变得难以处理了。很明显，人类的绝大多数和世界上大约130多个国家根本无法看到这种用途，而当有人试图以核武库的这一方面来说服他们时，又经常感到迷惑不解。这些国家以及核武器国家的千百万人民只看到，由于对核武器用途的这种信念所造成的核军备竞赛的升级，已无情地把世界带到核灾难的边缘。

一些核大国坚持，除非制止一切战争，否则就拒绝讨论核战争的威胁，这意味着世界将最终被武器的恐怖所笼罩的威胁。这是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一次警告，如果他们想要避免核威胁并继续生存，就要停止他们的争吵。这也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提问题方式，以致问题一经提出就成功地得到解决，而不强求承担任何解决该问题的义务。

一千多年来，人类以其不可征服的生存与丰富生活的意志幸免于很多战争。战争、需求和贫乏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陌生。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核国家安全理论中所含有的威胁，这就是，只要其他国家不消除冲突与紧张局势，他们就一直保有摧毁整个世界的选择自由。当然我们一直未能建立一个和协调和没有紧张局势的世界，为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但是，如核威慑战略中所暗示的认为不协调、紧张和冲突能够最终导致全球的毁灭，这种说法至少是令人震惊的。

无疑，在座的所有人都反对一切战争——不管是常规战争还是核战争。对印度来说，再没有比各国之间发动战争与我们的民族道德规范和传统更不相容的东西了。我国历史上一位国王阿索卡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放弃把战争作为国策或外交政策的手段。

然而，防止核战争的问题不能与常规战争分开来讨论的说法并不是一种解决我们议程上这一关键问题的严肃态度。如果我们按照这一趋势进行逻辑推理，那么我们就不会坐在本会议中分别——在不考虑所有战争以及这些战争的基本动机和原因的情况下——讨论禁止化学武器或放射性武器的议题。因此，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把所有战争都混淆在一起或在“防止核战争”的标题下谈论防止所有战争的趋势，不过是分散人们对核战争威胁注意力的手段。

试图把常规战争和核战争混为一谈的态度就是核战争所造成的危机、以及核武器出现之前所盛行的军事理论在我们时代的一种延伸。核国家所提倡的核威慑理论是大约一百年前北方工业化国家所遵循的在战争中取胜战略的延伸。克劳塞维茨对这一在战争中取胜的战略明确地阐述为，通过应用科学与技术、经过无休止的战争升

(杜贝)

级来追求威力，直至最后取得胜利。人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始终遵循这一战略。在战争中对伦敦和联合王国其他城镇平民的轰炸，以及对汉堡、德累斯顿和其他德国城市进行的更大规模的报复性轰炸，是核武器出现以前通过升级来实现这一胜利目标的最近的例子。

使我们目前面临核屠杀直接威胁的是，甚至在核国家得到核武器之后这一在战争中取胜的战略仍然没有任何改变。在主观方面，同样的军事战略仍在继续；而在客观方面，核武器的出现则根本上改变了战争性质。因此，自1945年以来，在军事战略家供认的意图与其武器性能的客观实际之间出现了一种预示世界末日情景的间歇。这种间歇的例子之一是，人所共知，当第一批原子弹投掷在广岛和长崎时，谁也不知道他们还可以由于受到放射而死亡。就在最近，当考虑到核战争的后果时，只考虑了冲击波、高温、迅速与长期辐射的作用和保护地球免受过量紫外线辐射的臭氧层的消失。然而却忽视了上千次爆炸所产生的数亿吨尘埃对气候造成的影响。确后一因素只是在核冬天的调查结论中得到考虑，而这一结论起初曾引起一些核国家及其盟国决策人物的怀疑和不信任，后来这一结论又由于一系列贫乏和伪科学的论点而引起强烈反对。现在，甚至这些国家也接受了关于核冬天的调查结论。然而，我们在关于这一议题的辩论中所听到为国家自卫而发动核战争辩护的论点明确表明，接受关于核冬天的调查结论并没有影响这些核大国及其同盟的安全理论。关于核冬天的调查结果明确表明关于使用核武器的一切战略都是完全无用的。威慑理论的信奉者总是试图不被对核战争可怕后果的讨论搞糊涂。他们一贯的做法就是，首先以所谓的理由使这些后果消声匿迹，理由就是这些后果是夸大的和没有稳固基础的，而当他们无法忽视这些后果的科学依据时，就耸一耸肩用一句话把整个问题打发掉：“那又怎么样？”

1945年以前时期的这种赢得战争的战略充满极其残酷的成份，而且完全无视他人生命和其他人类。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同一战略及其潜在的态度延续到由核战争威胁所造成的危机时期，后果将会怎样。

人们吃惊地发现，在过去40年间，主要军事同盟的军事理论和战略理论竟没能解决而且有意识地忽视核武器的后果问题。

(杜贝)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军事战略和安全理论所产生的无法区别核武器和其它战争工具的无能，看起来是很天真的，同时又是蓄意的。说它天真是因为不愿承认核武器在军事上的应用不象一门大炮一样。说它蓄意是因为这种战略和理论的信奉者有意试图混淆核武器和其它战争工具之间的界线，以便继续保持其使核武器在军事上得到应用的要求。正是后者一直刺激着核军备竞赛继续进行。随着核武器系统大家庭的逐渐扩大，军事战略家试图通过增加其导弹的射程（以便能够得到距离的保护）提高威力和准确性（以便能控制相应的损失）和提高速度（以利于突然袭击和保证把反攻的作用降到最低限度）。所谓第三代核武器正在以疯狂的速度得到发展，这种速度是同一进程的继续。随着最近开始对“星球大战”武器系统的研究，这种对核武器的军事用途的要求正寻找一种最终的合成体，例如免受反击的系统。

人们一直称誉核武器在过去40年间维持了和平。然而，这一时期的历史证实了相反的结果。过去40年一直充满紧张局势、激烈争夺和不断的灾难。在这段时期内，每个目前的核大国都在不同的时间——单独地、有时是联合的——参加了战争。在前几天就该项目的辩论中所引用的战后时期的130多次武装冲突中，北方的发达国家通过公开或隐蔽的干涉参与了其中的60%，而其中多数冲突是由主要大国挑起来的。其中一些战争是代理人战争。使南方成百万不幸的人民丧失生命。大多数战争都是在大国对抗的主要区域之外进行的这一事实决不能使这些大国推卸它们对这些战争的责任。尽管还没有发生过欧洲两个同盟之间的主要战争，但其部队得到部署的态势和其核力量得到安排以备攻击的应战状态，无论对它们自己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绝对不可能是一种保证或幸运。因此，拥有核武器曾用什么办法驱使核大国及其盟国采取了负责的态度呢？它又对1945年以来危机四伏的国际形势起了什么补救作用？

事实是核军备竞赛及其理论不仅没有成功地防止战争，反而使人类濒于最终毁灭的边缘。这里，我愿引证一段最近发表的由英国剑桥大学学者D·B·加利教授所撰写的文章：“核灾难不同于珠穆朗玛峰，只是耸立在那里，核灾难正在迅速地接近这里，只有对这一巨大发展进行历史性观察才能表明这种根本的差别。”

在一些尊敬的西方国家代表的发言中，谈到了他们认为已在采取的防止核战争的措施。其中，居显著地位的无疑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达成的限制核武器的协议。

(杜贝)

我们认为，这种协议与防止核战争关系不大。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希望以任何方式来降低目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正在进行的双边谈判的意义。尽管这些谈判只能恢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良好气氛，但还是对我们所有人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另外，如果这些谈判能够真正实现其“防止太空军备竞赛和终止地球上的军备竞赛，并最终消除任何地方的核武器”这一终极目标，则整个世界都会永远感谢这些大国。然而，防止核战争的直接措施并未列入这些谈判的议程。只要这些谈判在同一的战略稳定范围内进行、只要仍然保留发动核战争的选择自由、只要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规则得不到接受，这些谈判决不可能防止威胁着人类命运的核灾难。在对未来满怀良好希望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的经验，即以前的军备控制协议导致了两个超级大国手中核运载工具和弹头的成倍增加。例如，在1968年和1985年之间，两个超级大国所拥有的核弹头在一次增加了三倍，在另外一次增加了十二倍。

在过去100年间，国际社会为了使战争人道化，缔结了很多公约，1868年的彼得堡宣言、1907年的海牙公约、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及其1977年的附加议定书，就是这些法律文书的例子。这些公约和议定书的一些目标是：第一，限制敌对各方采取伤残敌方手段的权力；第二，避免使用引起不必要痛苦的武器；第三，特别保护未参与战争的平民；第四，不允许使用会造成中立国家大量人口死亡的手段。

核大国坚持寻求把核武器排除在这些公约的应用范围之外，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例如，在关于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的外交会议1975年会议上，美国代表指出：“旨在应用于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一条可接受的法律规则，当然只会在常规战争中提供很少或不提供任何保护。相反，我们正在本会议进行讨论的这种规则是针对常规战争的，因此不适用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范畴”。联合王国的代表在签署附加议定书时说，议定书“并没有指望对使用核武器产生任何影响，也并不控制或禁止这种使用”。这就产生了问题：一个国家或军事同盟，虽能在涉及使用武力或防止核战争时，把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放在同一范畴来论述，而当按照具体体现战争法的国际文书，涉及将要承担的义务时，却又把两类武器区别开来论述呢？

我很高兴地从尊敬的西方国家代表的发言中看到他们愿意认真地审议关于防止核战争的项目。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在1985年2月7日裁军谈判会议

(杜贝)

上的发言指出，“我们所领会的该议程的重大意义使我们产生了希望，这就是我们能够在1985年就这一议程项目开始卓有成效和实质性的工作进程。”尊敬的美国代表在发言中说：“我们随时准备在本会议和其它任何地方认真地参加对该重要问题所有方面的进一步审议”。同时这些代表还坚持认为，在对该议程项目的任何一种审议中，所有观点都应得到考虑和充分的探讨，而不在其中规定任何优先地位。这正是21国集团在审议该项目的特设委员会的权限方面所建议的。我在1984年4月26日解释21国集团立场的发言中已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审议向会议提出的每一项提案以及解决该问题的每一个办法的所有方面——法律的、政治的、技术的和军事的，而不在其中规定任何优先地位。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一权限不能够成为今年审议该议题的基础。

在这方面，这些国家所规定的起草工作计划和确定讨论不同提案的优先次序的独特先决条件，由于使建立讨论该问题机构的整个程序引起很大争论而不能不挫败我们的努力。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无休止地讨论应该讨论什么，而不是防止核战争的具体和实际的措施。我们没能看到在我们去年几乎达成一致的权限并没有排除讨论任何建议的情况下，为什么一定要有详尽的工作计划。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对这些已经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文件提出而且能够在为审议该项目而设立的机构中得到最好讨论的提案，西方国家集团还一开始就要采取提供提案清单的做法。我们能够得出的唯一结论是，这种行动旨在使关于讨论议题的讨论本身成为一个目的，从而摆出一付要干点什么的架势，而同时却使整个进程变得争论不休，并使本会议不能想尽各种办法来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

对1984年就该项目所进行的谈判进程的任何客观的评价，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21国集团在努力开始进行认真的谈判中表现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我们今年还愿意本着同样的精神并以同样的灵活性来讨论这一议题。但是我们感到很难对付西方国家集团不断改变的立场。去年，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同意根据大家就其权限所达成的协议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今年，他们又回到这个协议上，建议采取一种不同的讨论形式。去年，我们被告知在开始谈判之前，必须探讨和确定进行谈判的问题。为了尊重西方国家集团的这一立场，我们同意对拟议中的特设委员会没有谈判权限。今年，我们不仅被要求改变讨论的组织结构，而且被告知在探讨和确定进

(杜贝、主席、比斯利)

行谈判的问题之前，必须商定我们将要讨论的议题。这真是审议这一重要的防止核战争问题的严肃和真诚的态度吗？

我们也不同意一些西方国家表示的那种认为讨论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议题的观点。我们愿意说清楚的是：审议该议题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谈判就防止核战争的紧迫和实际措施达成一项或几项协议。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都等于降低这一世界上唯一的裁军问题谈判机构的价值，并且使我们放弃制定紧迫措施以使人类免遭核灾难的责任。

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地地道道是一只只能变出多种颜色的变色龙。这种说法符合核武器出现之前的战争。核战争的威胁所引起的不是变色龙的形象，而是眼镜蛇的恐怖——阴森可怕。因此，让我们直截了当地集中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旁敲侧击。这正如印度总理S·拉吉夫·甘地在讨论核裁军问题的6国首脑会议上指出，“让我们努力加强人类对其自身的信心和加强征服其技术所带来的灾难的能力”。

主席：我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

我现在请加拿大代表比斯利大使发言。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很清楚，我本来是想发表一个相对来说没有争议的讲话，但我现在却是在一个非常糟糕的时刻发言。然而，我个人还是要祝贺你担任主席，并盛情欢迎会议的新秘书长克玛蒂纳大使，因为在这之前我还没有正式地这样做。我还愿感谢前任主席塔伊尔阿达特大使和洛维茨大使，他们熟练地指导了本会议的工作；我这样说不是例行公事，我是怀着最诚挚的感情说这些话的。主席先生，今天我非常荣幸地在你的主持下发言，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就是朋友和同事，我希望我甚至可以说是军备控制方面的同志，另外使我格外高兴的是你代表一个与加拿大有如此紧密和友好关系的国家。

在一个我没有打算谈及的问题上，我认为我理解我们听到的发言和发言中涉及战胜纳粹主义的真诚感情。我国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场战争，我希望，如果我说我们认为我们为了保卫一个国家——波兰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在这场冲突的最初几天，就根据加拿大政府深思熟虑的独立决定，参加了这场冲突，是不会使人对我的



( 比 斯 利 )

动机产生误解的；我知道图尔班斯基大使在我这样说的时候也不会误解我的动机，因此，我认为在断定为什么我们应通过自己的努力避免这种战争的时候，回顾过去的战争。是恰当的。

我还要指出，显然任何国家都无法理解或体会到苏联所遭受的损失，这种损失非常巨大，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损失；但是如果认为我们大家都没有意识到那次战争所造成的损失，那就错了。很多加拿大家庭、包括我自己的家庭都损失惨重。我有一个兄弟受伤，一个被打死，我的姐姐在部队服役，感谢上帝，在我就要接替他们时战争结束了；所以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回答伊斯拉耶利安大使，而是和他一道坚决反对这种或其它任何战争。

去年九月新当选的加拿大政府把军备控制和裁军放在高度优先的地位。在一系列的公开讲话中，布赖恩·马尔罗尼总理明确指出“最紧迫或最必要的事业……莫过于对减少战争威胁和进一步推动和平事业作出贡献”。他指出了一个月会议人人皆知的事实，即进展将是“缓慢和艰难的进程”，但他强调“我们不能放松减少战争威胁的努力。不管如何令人失望和困难，谈判必须进行”。

后来，在马尔勒尼总理和里根总统3月18日在魁北克市的一次会晤中，两位领导人说：“我们寻求一个核武器的水平得到大量削减的更稳定的世界”。根据我们刚刚听到的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发言，似乎应该指出，这些发言同意“有意义的、平等的、持久的和可核查的军备控制措施，可以在加强战略稳定、在较低的武装力量和军备水平上维护我们的安全，并减少战争危险——不管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中发挥作用。”而且他们还阐明了自己的决心——这对我们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在维也纳、日内瓦和斯德哥尔摩的国际谈判中就有效措施达成协议”并在该进程中实现东西方之间大量削减武器。

同样，在每39届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负责对外事务的国务卿尊敬的乔·克拉克先生指出：“加拿大决心继续在寻求和平与裁军中起到主导作用。”尽管那些对西方国家的谈论意味着另外的事情，我们却真诚地遵循这一点。他接着更具体地说：“我们将通过具体和现实的步骤寻求在全面禁试条约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将鼓励超级大国和关于所有外空武器的多边讨论，并将进一步研究一项禁止外空武器的条约如何才能得到核查。我们还将努力使明年的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取得成功……”

( 比 斯 利 )

以便防止核武器的横向扩散。”，这个问题我下面还将提到。他接着说：“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一项可核查的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的公约。”，而这正是加拿大代表团参加本会议的政策基础。我们奉有严格的指示，要尽力使裁军谈判会议能够继续其实质性工作，并停止对程序问题的纠缠。这一点我下面也要提到。

加拿大政府在本会议之外的军备控制和裁军的主要优先任务是：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武器谈判的进展作出贡献；保证不扩散核武器。

在裁军谈判会议内部，我们的主要优先任务是：全面核禁试条约；防止外空军备竞赛；以及早日缔结化学武器公约。

在寻求这些目标的同时，加拿大政府还有责任推动裁军谈判会议讨论其他军备控制问题，特别包括：防止核战争以及关于放射性武器的条约。

我在本届会议的发言比较晚，在我前面发言的很多代表已对以下三个问题谈到了其中的一个或两个：他们都强调了裁军谈判会议现在作为裁军问题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重要性；他们遗憾地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及其前身——裁军谈判委员会，六年来，现在已将近七年，没有达成一项协议，所以要积极推动谈判进程；这一点是今天早晨由我的朋友和同事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提出的；代表们还表示希望，美利坚合众国与苏联之间的双边谈判将赋予裁军谈判会议以新的活力。

无可否认，参加本会议的所有代表团都十分繁忙。面对如此紧凑的会议时间表，很多代表很难参加所有的会议。但是我们取得了多大进展呢？在过去的其他发言中，我和其他代表一样强调了会议进程本身的重要性，但是我也讲过，我们不能把会议进程与进展混为一谈。

今天早晨有人再次提出，如果会议进程象我们所说的那样重要，为什么我们仍陷于大多数问题的程序性讨论，而不进行实际工作以便取得我们和我们所代表的人民寄希望于该论坛的结果呢？同样，在以前的发言中，我还提出过这样的意见，认为关键是首先集中确定困难问题上的共同点，然后设法加以扩大，而不是象我们经常作的一样，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有分歧的问题上。人们会记得我在1984年7月3日全体会议的即席发言中援引了一个最权威的人士——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的话，正好讲的是这个问题：根据最近发现的一份十七世纪的文件，他提出劝告

(比斯利)

说：“我们不该谈论那些使我们分裂的东西，而应专注于那些使我们联合的东西。”我们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劝告。我当然承认，共同点经常只包含一个最小公分母，但尽管如此，如果它能够使我们的工作向前推进，我们就应该接受，不过把它作为实现我们最终共同目标这一漫长道路上的第一步来接受。

现在有很多代表已表示希望美苏双边谈判将会在这个多边论坛中产生积极的鼓动效果——希望这些谈判会赋予这个论坛以新的生命。直到上星期这种情况在很多问题上仍未发生。

然而，我们确实终于取得了一项重要的突破，这就是在两年的讨论之后于3月29日就外空的权限达成了一致意见。我提到这一事件，不仅因为其内在的重要性，而且因为它可以成为我们在其他问题上的榜样。

谈到外空问题，拟议中的权限不一定包括在坐各位所希望的全部内容，我敢肯定情况就是这样；某些人甚至认为这种权限是最起码的共同点。然而，权限不仅允许而且要求本会议采取实质性行动。正如我在3月29日的发言中所指出的，这是一个现实的权限，因为在现阶段它是探讨性的，但无论如何不应把它看成是一种狭窄或限制性的权限，因为它对很快就要进行的具体工作提供了基础。如果本会议想在推动外空这一敏感和重要的问题上起到积极作用，现在确实是根据这一商定的权限开始进行认真工作的时候了。

我在同一发言中还指出，在外空权限上达成的协商一致反映了对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国、对这个会议本身，而且特别是对主要空间大国的极大信任。我认为我们已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长期未决的重要程序问题，我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有意识地作出努力来确定现有的共同点，并作出灵活的反应，以期在我们前进过程中加以扩大。

作为第一步，加拿大已经准备就绪一份涉及国际法并适用于太空的现行条约和协议等有关部分的研究报告。我认为，这是一个应立即根据拟议中的权限加以讨论的议题。我们对共同享有我们的研究成果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会有助于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迅速开始。

在一项禁核试条约的重要问题上，加拿大拥护重新设立附属机构，以便解决有关核查与履约等实际问题的努力得到加速和具体化。

( 比 斯 利 )

我们认为这是加速条约取得进展的第一步。即使没有这一商定的权限，也有必要指出，去年秋天所进行的国际地震数据交换就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事件的例子，这种事件的结果一经分析出来，就能对核禁试条约真正取得进展作出贡献。这一试验是在30多个国家之间本着真诚合作的精神进行的。试验产生了大量有用的情报，它使地震小组能进一步改进它早些时候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的报告所描述的地震数据交换程序。地震小组上星期开始对这一试验进行评价，并为做好这一评价规定了大量有待完成的工作。我们建议，不管我们作出什么样的程序性决定，这一工作和关于核查与履约等其它问题的工作必须继续进行。

在联合国大会上，我们支持并实际上共同发起提出一项决议，敦促裁军谈判会议采取步骤，尽早建立一个国际地震监测网，监测核爆炸和确定这种监测网对监测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遵守情况的能力。这一提案涉及我们已知的分歧的核心，即一项核禁试条约能否被核查。决议还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开始详细研究监测和核查该条约遵守情况的其他措施，包括监测大气层放射能的国际监测网。

我们希望在本届会议上能够在这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如果我们就此停步，那么一项核禁试条约的问题就不会解决。对加拿大来说，实现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仍然是我们的基本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参与发起的大会决议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在1985年会议一开始就重新设立特设委员会，立即恢复有关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实质性工作，——而现在还包括范围的问题以及核查与履约的问题，——以期举行关于条约的谈判。这样，由加拿大和其他西方代表团提出的关于核禁试条约特设附属机构的权限草案（CD/521），将由于包括范围的问题而使1982年和1983年达成协议的核禁试权限大大扩大。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做了尽管是很微薄的努力，来扩大共同点的范围，这就是我们能够根据先前已接受的东西，通过一系列逐渐增加的实际步骤，把问题发展和扩大的事例。现在有人会争辩说，甚至这种扩大了权限也不能接受，因为它只有最起码的共同点或甚至还要少。但如果我们想在全面禁试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就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而我们确实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我在想，如果我们去年这样做了，是不是我们现在会略为接近一点全面禁试条约的目标。

( 比 斯 利 )

大约一年前，我曾在这个大厅表示，加拿大同意，对一项核禁试条约，不论在程序性还是实质性问题，都采取分阶段的办法：但首先我们要商定一个权限。然后我们应该寻求就一个关键性领域确立共同的理解，这是进一步取得进展的很多先决条件之一，即核查一项协议的现有手段的效力。例如我们意识到在现有技术是否足以检测核试验的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但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将有助于我们确定情况是否如此。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下一个商定的优先领域。显然，谈判必须是我们的目标——当然这是加拿大的立场——但能够而且应该首先奠定进行具体谈判的必要基础。这就是我们在化学武器工作中一直遵循的而又能使我们取得一些成功的进程。这也是我们现在一致同意并希望我们能够在外层空间问题上遵循的进程。在这个问题上，可能需要一些代表团采取灵活态度，但如果人们能够同意把它作为最起码的共同基础，我们就能够立即开始工作。

谈到化学武器，我应该用几分钟来专门谈论一下这一议题，因为现在这段时间是1985年第一期会议上专门拨出来供全体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的。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在1984年会议期间，在R·厄克于斯大使的出色主持下作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不仅澄清了很多问题，而且集中精力讨论了未来协议的基本结构问题，我愿对他表示我个人以及我国政府的感谢。

图尔班斯基大使已经表明我们选他作厄克于斯大使的继任者是非常明智的。他不失时机地为1985年会议制定了化学武器谈判的方针。因此我希望，如果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我们将至少可以在1985年会议期间接近于完成我们的工作。我承认，这一要求是比较高的。然而三个工作小组中的工作却进展甚慢，而且似乎有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我不是指哪一个集团或哪一个代表团——即利用这一机会来重述过去的立场和谈论陈旧的问题。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努力争取的是确定那些我们一致同意的的问题，然后就那些尚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进行工作，而不是比以往更详细地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换言之，我们必须避免由于我们的工作方法而造成僵局。

很清楚，我们的谈判正处于必须讨论某些关于核查的关键问题的阶段。我想对那些反对把有关核查的概念问题与具体问题分开来讨论的代表团说，我们几乎看不

( 比 斯 利 )

到有什么迹象表明设法以某种手段来解决核查基本要求的意愿。例如，在公约生效时，必须根据宣布的情况对视察储存和生产地点的程序达成协议，这意味着要就这种视察的原则达成协议。否则我们怎么能够肯定生产地点已被封闭，并在摧毁之前不再运转呢？尽管普遍同意在销毁现有化学武器期间不断进行视察的观点，然而在监测摧毁生产手段问题上没有达成同样的协议。质疑性核查的问题必须进行客观的讨论，我很感兴趣地听取了尊敬的苏联代表刚才所作的谈及该问题的重要发言。我认为现在需要的是提案，我们知道美国代表团主动提出了详细阐述它对这些问题的观点的提案。我们确实认为，那些对问题持不同看法的代表团——我们并非直接批评其他代表团——应做好准备，就可能的备选方案提出他们的提案，并且如果必要的话刷新以前的提案，以使真正谈判的进程向前发展。第一步显然是要提出问题，这种情况似乎正在出现；但第二步，我希望应是在考虑到谈判现状的情况下，提出有关的建议或反建议。

在一个单独的而且看来似乎是程序性的问题上，正如去年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报告所提出的，图尔班斯基大使已就工作延续到秋天甚至可能到1986年初的议题举行了协商。根据联合国大会第39/65 C号决议的敦促，我国代表团准备同意增加今年讨论该议题的时间。尽管存在明显的困难，而且有些困难对很多代表团来说确实很大，然而我们还是准备在裁军谈判会议的两次定期会议期间的任何时间继续进行关于公约的工作。确实，在有关实际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不断出现的情况下，我们怎能放松努力呢？我再用一点时间谈一谈我个人的事，对化学武器的作用我有所了解，因为我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受到过化学武器的折磨：我们许多人都是带着个人的信念以及国家的立场来参加本会议的。在我看来，在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些武器被取缔好久以后，又重新使用这些可怕的武器，这愈益加强了我们这一工作的紧迫性。

我过去曾强调我们十分关注化学武器扩散的危险，并指出，这种扩散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地区性紧张局势，并导致新的地区性武器竞赛。这种扩散现在不再仅仅是理论，而已成为事实了。

任何战争都产生可怕的后果，但使用化学武器极大地加重了人类的痛苦，它表明，这是一种全然无法接受的冲突的升级。而且，正如我刚刚指出的，它还是对以

(比克利)

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形式制定的国际法的违犯。由于这一原因，加拿大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对某些可能对生产高毒性化学战剂有用处的化学品在出口上实行控制。我们承认，要消除所有已知化学战剂的众多生产途径，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这一重要目标只能通过对所有化学武器实行一项可核查的禁令才能实现。

当然，重要的是应铭记，在本会议和在未来化学武器公约范围内就禁止使用问题所作的努力，无论如何不得损害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地位或义务。去年，当我在禁止使用问题上以阿·厄克于斯主席的朋友身份行使责职时，其他代表团私下以及在我主持的非正式讨论中经常向我提到过这一点。与此同时，至关重要的一项是，应考虑到各国代表团由于用语不准确，对可能造成的漏洞的合法理解，用确切的提法，保持《日内瓦议定书》的全部效力和作用。

请允许我提请大家注意我刚才提到的非正式讨论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1983年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CD/416)概括论述了未来公约中可能提及的基本禁止使用的各种方式。裁军谈判会议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CD/539)的附件一试图以条约草案的用语重新安排这些方案。这些文件以及在我刚提到的非正式讨论中很多代表团的发言，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禁止使用问题的提法及其与未来公约其他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认为禁止使用问题的提法应以任何合格的声明或保留意见使之尽可能简单和流畅的观点，一直在赢得更多的支持，这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当然，人们认识到这种办法把一部分负担转给了公约的其它段落，例如那些关于定义和准许活动的段落。人们当然有理由争辩说这类问题本该属于这些段落。此时我当然不希望详细论述这些问题，但是我要重申我几次非正式提出过的观点。正是由于我们努力通过极其非正式的程序明确了可能有共同点之处的性质和范围以及一些可能有灵活余地的地方，并且寻求澄清、明确和逐步扩大这一共同点时，我们才得以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这种进展。很明显，为了在这一问题或其它任何问题上做到这一点，我们一定不要使我们的立场固定或拘于一格，从而使我们倒退到对立的困境。大家都承认，绝对禁止使用的确切提法问题——我提出这一点只是为了说明问题——以及公约与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有在我们能够决定如何解决其它有关问题之后才能最后得到解决。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既有所前进，又不致陷入一个循

环反复的进程呢？

(比斯利)

我认为，我们在任何问题上应该采取的做法是，争取就提出的问题达成原则上的协议，例如在临时的基础上并根据明确的理解，就使用达成短期的规定，这种理解就是，相互关联的问题将逐个得到解决以便就这些问题的每一个问题进一步达成原则协议。对每一个问题的条约用语的最后批准可等到整个协议达成之后再行。这一办法也可以应用于条约的其它部分，我认为也可用于其他议题。因此，让我们继续非正式地相互听听彼此的意见，以便确定是否存在共同点和灵活的余地，然后努力加以扩大，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把相互关联问题的案文暂时放一放。如果我们遵循这一进程，同时把我们的经验应用于关于化学武器的其它问题上以及其它地方，我想我们可能比不这样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谈到防止核战争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裁军谈判会议可以取得巨大收获的问题，但条件是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集中努力明确共同点，然后向我们的共同目标前进。谁也不会否认，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成为这种共同点的极为客观的出发点就是《联合国宪章》。

然而，防止核战争需要所有国家尽最大努力来保证战争不再被认为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我曾指出，《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我很感兴趣地聆听了尊敬的印度代表的重要发言，他与我们一样关注核武器所造成的危险，即灭绝整个人类的危险。我们始终认为防止核战争必须是军备控制和裁军措施的一个主要优先问题，但我们还始终认为该问题不能也不应与那些我们将再次谈到的原因分隔开来考虑。在联合国大会上，加拿大与其他代表团一道提出了一些我们认为有利于更广泛地在核时代防止战争的目的的措施。我们认为这些想法应得到认真的考虑，我们愿意在这里继续加以阐述，倾听其他代表团的反映和他们的意见，并对此作出我们的答复。我国代表团希望裁军谈判会议在本届会议期间设立适当的机构以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审议该议题。

但是，不管采取哪一种组织机构，我们认为更基本的是，必须清楚地理解和同意，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都应该完全自由地根据这一议程项目提出和讨论它认为有关的任何问题。例如，我们不反对讨论核威慑的问题；同样，恰恰因为有危险，我就不明白我们怎能不讨论常规战争问题，然而肯定没有人会否认常规战争会引起核战争屠杀。<sup>10</sup> 另外，如果象尊敬的印度代表所建议的，从自卫



(比斯利)

的角度看待核威慑和常规核威慑问题，那么其他国家就会认为，这会进一步启发我们的讨论。我们至少可以对此进行讨论和考虑。同时，我们认为最好应该回顾一下，所有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甚至印度也被瑞典每年列为进行核爆炸的国家。现在我们一点也不怀疑印度关于其爆炸装置的和平意图。我们不明白的是否应该在本会议对其他国家的意图提出疑问。我们知道不存在区分和平与非和平爆炸的科学或技术依据——然而，我们并不质问印度的动机。理所当然，我们也不欢迎别人用诸如“西方国家”、“西方集团”等等的广义词汇来质问我们的动机。就加拿大而言，不管我们的防御安排如何，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已掌握这种技术，然而我们却放弃了，我们决定加入《不扩散条约》。我本来准备回过头来再谈论这个议题，但我认为这是不适宜的。

现在如果我们不能就这一相对来说不大的共同点——即我们各自可以自由地在进程一开始就讨论任何问题——上达成一致，那么我确实不对该项目的未来抱有很大希望，尽管它具有潜在的重要性。

作为对该过程的贡献，加拿大支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CD/578号工作文件所阐述的一般性办法，但不是作为将要讨论的最后或唯一的问题清单、不要求人人都接这个办法，而是作为我们能够考虑的那种办法的提示。我们认为，正如韦格纳大使指出的，文件有助于我们的审议，而提出的名单仍然有改动和修正的余地。如果其他代表团或代表团集团能够采取同样的或补充性的、甚至是不同的办法，我们就可以共同奠定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但不必集中精力于那种尊敬的印度代表所批评的具体细节。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对待我们的工作，我认为我们是期待采取一些认真行动的。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有可能这样做，而现在正是开始这样做的时刻。

关于放射武器问题：从1980年以来，加拿大就敦促裁军谈判会议根据经美苏1979年同意的草案，缔结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然而，我们知道本会议某些成员国对仅仅根据该提案进行工作有很大的保留。一年前我强调了解决放射性武器问题的好处，这是1948年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在讨论的议题，我还建议我们都应审议各自对批准该条约草案这一目标的立场。

目前，美国和苏联代表团都在今年的会议上表示了要早日达成协议的愿望。我

( 比 斯 利 )

国代表团同意早日就苏美已达成协议的条约草案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然而，我们同时也将积极支持双管齐下，努力制定一个方案来解除人们对进攻核动力电站所表示的严重忧虑。很多代表团已强调指出它们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这是不容忽视的。

我愿指出对会议信誉具有积极影响、可供放射性武器问题达成协议效法的某些先例。另外，关于该问题的决议对裁军谈判会议“顺利”达成协议的进程是极其有益的（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多少最新的经验）。无论其内在重要性如何，这样一种协议也将有助于使我们的机构恢复活力。把问题“解决掉”的益处是不言自明的。同样，如果我们能够很快地就已有一致意见——即共同点——的问题达成一致，我们不就可以在仍然有观点分歧的方面进行严肃的工作了吗？也许我们可以商定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同时直到谈判后期就整体方案是否恰当作出决定，但同时我却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一点作为。

在1984年到1985年裁军谈判会议期间，渥太华的对外事务部对放射性武器谈判进程进行了一次审议和评价。我希望我们能够在1985年会议期间提出一些看法。在渥太华进行审议期间，为了方便起见曾制定了一份两卷本的裁军谈判会议逐字记录和提交本会议的工作文件简编，现已由加拿大政府大量印刷后送日内瓦作为基本文件，散发给特设委员会的有关人士。因此我将向秘书处提供足够的数量以便发给各国代表团。

现在把话题转到谈判进程：我想在座的每一位都充分意识到，裁军谈判会议必须同时就许多不同的议题进行工作，因为对这些议题的相对重要性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成熟程度有意见分歧。我们还意识到，实际上某些方面的工作确实要比另外一些进展大一些，因而进度不完全一致。然而，当人们听到本届会议期间有可能就化学武器公约取得进展时，如果以为这是我们能够取得进展的唯一项目，那就未免使人感到不安。大家公认，其他关键问题的进展可能或被认为与两个主要大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有关。然而我们不能同意的是，裁军谈判会议一定要暂缓进行以等待这些双边会谈的结果。我们确信，我们的多边努力能够而且应当有助于这些双边努力。

我们坚信，用更好的工作方法并本着合理地迁就对方利益的意愿——不是在原则问题上进行妥协，而是真正的和解和谦让——我们就能不仅同意核禁试特设委员

(主席，达赫尔曼)

会的现实和实际的权限和就防止核战争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的程序性基础，而且能在化学武器的全面公约方面取得具体进展，甚至能缔结一项有限的放射性武器协定。

我又一次提到不要把进程与进展混为一谈的重要性。裁军谈判会议及其前身6年来没有达成一项军备控制协议。今年是联合国成立40周年。现在是应该作得更好一点的时候了。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尤其应该如此。

主席：感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之词。

各位代表，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已经用完了。鉴于还有三位代表要求在今天发言，我打算现在宣布全体会议休会，而在今天下午3时准时复会。届时我们将聆听他们的发言，并且在这之后立即召开定于今天举行的非正式会议来审议我早些时候提到的问题。

因此，全体会议将复会以正式确定可能在非正式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如果没有人反对，全体会议现在休会。

会议于下午12时50分休会并于下午3时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第306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

我们将听取要求在今天下午发言的代表们发言。

我现在请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O·达赫尔曼博士发言。

达赫尔曼先生(瑞典)：主席先生，我感谢有机会在本会议发言，报告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最近的工作成果，并向你们介绍载有我们最近一次会议的进度报告的第CD/583号文件。

(达赫尔曼)

该小组于1985年3月25日至29日举行了会议，来自22个国家的专家和代表以及世界气象组织的一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该小组从一开始就得到本会议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广泛参加。中国也作为小组的一个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上星期会议的目的是审议小组去年组织的技术试验迄今所取得的结果。

大家还记得，小组在1984年的夏季会议上一致同意就交换和分析所谓一级地震数据——检测到的地震信号基本参数——进行一次技术试验。详细的计划业已制定，并以第CD/534号文件提交给你。

商定的试验目的是：第一，试验在地震台站提取一级参数的程序；第二，世界气象组织一道研制和试验，从临时的国家设施向国际试验设计中心——通常称为EIDCS——定期传输一级数据的程序，其中包括索要和重新传输遗失或经窜改的信息等程序；第三，在国际试验数据中心试验拟议中的程序，以接收一级数据并予以存档，以便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讯系统编写和散发地震事件简报和以该一级数据为基础的参数。

技术试验根据计划于1984年秋天举行，并包括从10月15日至12月14日的地震观测。在EIDCS编写地震事件简报以及向参加国传输这些经过分析的数据一直要延续到1985年1月15日。

根据试验之前提交给裁军谈判会议的关于技术试验的原定计划，27个国家当时已经同意参加试验。继而小组第18次会议进展情况报告(CD/535)刊载了要求各国更广泛参加试验的呼吁，8月21日经裁军谈判会议批准，又有11个国家表示对参加试验感兴趣。这样，一共有38个国家的79座地震台站应为之提供数据。然而，还不能肯定所有国家和所有台站能真正参加并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讯系统提供数据。

在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和华盛顿的3个EIDCS，报告的数据已收集起来并进行了分析。由于不能确定实际参加情况，来自一些台站的数据没有在所有的EIDCS得到利用。包含分析结果的地震事件简报定期从这些中心传输给各参加国。

不仅全世界的地震机构参与了试验，而且很多国家的气象机构以及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通讯渠道也参与了试验。工作小组在试验期间和在以往工作中一样，与世界

(达赫尔曼)

气象组织进行了很好的合作。

试验包括很多工作；我个人估计，在很多地方的工作量要大大超出试验之前的设想。如果没有地震机构、世界气象组织联络网和EIDCS的很多人的献身努力，试验是不可能成功进行的。我们在试验期间还看到了参加者之间的合作精神和克服任何困难的意愿。在这方面还应感谢试验协调员澳大利亚的G·麦格雷戈博士的成功努力。

我认为试验是成功的，这是因为，第一能够基本上按计划进行实际试验，第二是因为我们在试验期间所取得的经验将会对进一步发展工作小组所设想的全球系统的科学和技术方面作出巨大贡献。

试验是一项巨大的任务，很难加以充分形容，但列出几个数字则可以表明这一全球合作的规模：一共有大约20,000个地震信号在参与站台进行了分析，从中提取了150,000多个参数。这一数据已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讯系统作出报告，并在全球范围交换了4,000多条信息。根据EIDCS的分析结果，利用报告数据检测到大约1,000次地震事件，并确定了其方位。

这些信息还反映了生活现实，例如下面这条来自欧洲地震台站的信息表明，“站台于12月14日00·00协调世界时停止工作，测震表被窃。”

关于技术试验所有方面的大量情报经验已由小组收集并编写好，而且将反应在今后的报告中。在我们的会议上大约50份国家工作文件提供了各国通过试验取得的经验，这些文件有1,000多页。分析和估价这些结果，以及从中得出全面的结论将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工作小组商定了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关于试验结果报告的提纲。在我们最近举行会议期间，研究小组的召集人和共同召集人、以及小组的科学秘书挪威的罗得·林格达尔博士开始起草了该报告的第一稿。小组同往常一样得到了秘书处提供的出色服务，秘书处处理我们技术资料的方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鉴于对这些深入广泛的结果进行最后分析将需要进一步的工作，在此我不能与你们一起享有任何试验的详细结果，只能指出哪些地区进行试验将扩大我们的经验。

在各地震台站也取得了关于工作量和提取一级数据技术程序的经验。自动化和

(达赫尔曼, 主席, 巴塞莱米)

交互式处理——即人与计算机紧密配合进行工作——在一些地方也进行了试验, 以提取和报告大量参数。报告大量连续发生局部地震事件的程序也进行了试验。

试验将提供广泛使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讯系统的经验及其处理传输地震信息量的能力。它还将提供关于临时国家设施——即形成地震信息的地方与国家世界气象组织中心——把这些信息输入全球电讯系统的地方——之间重要联系的经验。试验还将进一步提供关于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讯系统方面收不到信息的问题以及信息因经过重新传输程序而受到减弱的程度。

该试验也是对国际数据中心确定的程序进行第一次实际试验, 因此是非常有益的。在得出肯定结论之前, 必须对来自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和华盛顿的三个EIDCS取得的结果进行比较。这种比较还将提供关于简报协调程序用于减少EIDCS, 所出简报的差别方面取得的结果。我们在试验过程中还发现, 和以前在同样情况下经历的一样, 即来自各独立台站的一些观察报告结果同EIDCS所报告的局部地震事件没法配合起来。这是我们今后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小组还讨论了进一步工作的计划。小组对继续其工作以编写一份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的关于技术试验的全面报告进行了设想。小组同意所有参与者应在1985年5月1日之前为向研究小组召集人和共同召集人提交的报告提供资料。6月1日, 召集人应把章节草案提交科学秘书编入报告草案, 而后者应在小组召开下次会议之际准备就绪。

小组认为, 其下次会议需经裁军谈判会议批准, 应在1985年7月15日至19日之间召开。

关于科学专家小组的进展情况报告(CD/583)我就介绍到这里, 我愿回答本会议各位代表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

主席: 感谢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的发言。

我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巴塞莱米先生发言。

巴塞莱米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 鉴于这是美国代表团第一次在本

(巴塞莱米)

月份发言，我们祝贺你担任本会议的主席。南斯拉夫在国际政治和裁军事务中早就具有积极、受到尊重和独立的看法，我们保证在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给予充分合作。我国代表团还愿赞扬尊敬的委内瑞拉同事塔伊尔阿达克大使在上月主持我们的讨论时所表现的容忍和坚毅精神。

我们代表团很感兴趣地听取了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达赫尔曼博士关于介绍第CD/583号文件所载该小组第19份进度报告的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愿通过你向达赫尔曼博士、科学秘书挪威的林格达赫尔博士以及整个科学专家小组所继续进行的非常有价值的工作表示我们的感谢，特别是对科学专家小组去年进行的技术试验所取得的出色成绩表示感谢。

我们还应特别感谢和赞扬澳大利亚的D·麦格雷戈先生，他非常出色地处理了组织这一复杂而广泛的任务中许多错综繁琐的问题。我们还感谢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澳大利亚代表团，他们负责主持了第19次会议前一周进行的非正式工作协商。参加协商的人对整个小组所取得的进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最后，我们要感谢世界气象组织，如果没有该组织的不断协助，技术试验将是不可能的。

上星期，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已开始准备关于技术试验结果的报告。这需要他们作出耐心和坚定的努力，才能研究制定技术试验的目标和程序，才能准时进行试验并开始对结果进行分析。我们相信裁军谈判会议将从这些努力中获益。这种努力所带来的重大好处就是小组不断得到出色的合作，我国代表团在8月21日的发言中指出，这种合作必须继续。

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贡献了大量资源来支持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科学专家小组的努力为我们议程项目1即核禁试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需要发展支持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的技术能力和技术知识，这种交换对根据未来核禁试条约对地下环境进行全球性监测是十分必要的。在这种努力中，科学专家小组一直是并且继续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组织。技术试验清楚地证明了这一事实：小组正继续在利用全球性地震团体研制数据收集、交换和处理的程序方面取得巨大进展。

科学专家小组计划1984年的技术试验将提供在国际范围内处理和交换地震

(巴塞莱米)

数据的经验。其目标是研制和试验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电讯系统定期传输所谓一级数据的程序。这种做法允许在国家一级水平上试验提取一级参数的程序。这些试验反过来被传输到国际试验数据中心，同时经过重新加工以编写地震事件简报，并试验通讯联系和编写地震事件简报的程序。

技术试验是如何成功地完成这些基本任务的呢？我国代表团高兴地获悉科学专家小组正在对技术试验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价，这将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一个完整的答案。为支持这一评价，人们在国家报告中提供了大量情报——据达赫尔曼博士报告，大概有1,000页的文件。我们还高兴地注意到又有很多国家参加了试验。我们相信，参加国家的增长将对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的能力作出更现实的估价。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法国在提供地震数据方面为技术试验所作的贡献，以及中国参加科学专家小组第19次会议的事实。我们期待在小组中同他们加强合作，并将欢迎来自全球地震团体的更多参加者。

我国代表团期待收到关于技术试验结果的完整报告并审查科技专家小组将从中作出的结论。美国准备为此目标努力工作。因此，当获悉小组又将象今年春天受到的限制那样，只能在夏季召开一周会议时，感到十分失望。据我们了解，苏联的专家不愿同意正常的两周会议。不可避免的后果将是推迟完成小组的报告，鉴于我们对及时收到一个完整和全面的报告都很重视，这种推迟是令人遗憾的。

有些参加技术试验的国家公然决定不报告核爆炸所产生的地震数据，对此，我国代表团也深感遗憾。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记住，一个可能的业务数据交换系统的目的是为了向参与国提供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能力。很多核爆炸发生在数据收集期间，人们对从这些地震事件发出的信号作了大量记载和报道。而技术试验是根据科学专家小组在试验之前商定的程序进行的。因此，不报告一个地震台站所观察到的所有地震信号的作法是很难理解的。另外，其他参加国所报告的由核试验产生的地震信号并没有在苏联所管理的国际试验数据中心在试验期间进行加工。这种作法令人不安，而且令人遗憾的是，人们不仅在这一问题上而且在更重大的问题上对苏联作出的承诺是否值得重视产生了疑问。

尽管存在这种令人失望之处，但特设工作小组技术试验的初步成果是令人鼓舞



(巴塞莱米, 主席, 今井隆吉)

的。不仅大量数据得到交换和处理,而且明确了需要将来集中努力以改善全球交换情况的一些问题。因此,我们殷切期待科学专家小组提出它的分析报告,特别是对进一步努力加强全球地震数据交换系统的工作提出建议。

主席: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

我现在请日本代表今井隆吉大使发言。

今井隆吉先生(日本):主席先生,现在已是裁军谈判会议春季会议第3个月的月初了,请允许我祝贺你维达斯大使先生担任4月份的主席。我相信,现在正是不结盟运动的首创精神和裁军理想得以及时和积极地为制定全球裁军政策,特别是关于我们必须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处理的议题的政策作出贡献的时候,我们相信,在你的指导下,本会议将在工作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还愿借此机会真诚地感谢离任主席塔伊尔阿达特大使干练地指导了本会议3月份的工作。

今天我们收到了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第19次会议的进度报告。我必须说报告是非常有用和发人深省的,如果人/机器的相互作用是数据传输方面所提到的问题之一,我肯定专家/裁军谈判会议的相互作用也许就是报告充分阐述的问题。我们当然欢迎这份报告,主席先生,我愿通过你转达我国代表团对专家们出色工作,特别是小组主席达赫尔曼博士的报告和领导才能的赞赏。

根据进度报告,我们了解到,在1984年10月15日至12月14日期间所进行的技术试验产生了极为有用和令人感兴趣的成果,提供了关于地震数据传输的情况。作为首先提出与世界气象组织安排定期使用全球通讯系统的国家之一,看到很多地震台站和国家参加了这一活动并产生了结果,我国代表团感到十分高兴。主席先生我们将借此机会通过对世界气象组织在试验期间给予特设小组的合作表示赞赏。我们还感谢澳大利亚麦格雷戈博士在试验的全面协调方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今井隆吉，主席，德帕斯)

我们注意到，在报告中工作小组通过真正的全球范围的试验积累大量经验并编写了大量情况，我们真诚希望小组将进一步恰当和全面地对这些东西进行分析和估价，使最终提交本会议的报告能为今后采取行动提供有用的建议。同样在决定改进世界地震网络的成本效率和该地震网络作为一项核禁试条约范围内多边核查系统的数据传输能力的室内活动方面，特设小组的工作方向看来也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因此，我们认为本会议应批准进度报告提出的要把该小组的工作继续下去的建议。

科学专家小组将在夏季再次召开会议以进一步完善对结果进行分析的工作，并继续其估价工作。如果这种估价将导致完善全球地震观察网络活动的增加、并在寻求地震观察和自有关地震事件释放的能源之间的良好关联作用中导致改进技术的话，这将是极为有用的。这很可能会涉及到恰当和有效的二级数据交换。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出色工作，并表达我国代表团的信念，即这种分阶段的进展是核禁试条约的必要组成部分。

主席：感谢日本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

今天名单上的发言者已全部发言完毕。我现在请比利时的德帕斯大使发言。

德帕斯先生(比利时)：我在1984年到1985年期间一直负责协调西方国家集团对防止核战争、包括所有有关事项——即议程项目3的全称——问题的立场，因此我愿消除尊敬的印度同事对西方集团成员是否愿意认真对待这一问题所表示的忧虑。我愿强调指出，说西方国家集团希望“阻止本会议处理真正问题”是错误的，也是不公正的。令人遗憾的是，在1984年，尽管一些代表团作出了巨大和长期的努力——其中首先必须提到的，显然是印度代表团，但在本来可以导致就有关议题设立一个工作小组的权限条款上并没有达成协议。关于该议题所进行的协商并没有导致基本的协商一致。过去探索的途径说明并不是正确的途径，这就是我要鼓励西方同事们今年寻求不同途径的原因。

这种态度的改变只是反映我们希望取得圆满的结果，而不是陷于僵局。我们愿

(主席, 杜贝)

意给这一困难问题找到新的解决办法。因此, 对西方同事来说, 这绝不是一个倒退到实际上从来不存在的协议上的问题。

我还必须指出, 我认为在全体会议上描述我在非正式协商时所作的、被你认为是“特殊的先决条件”的建议, 看来不会是有利于寻求西方国家集团仍全面坚持的协商一致的最好方法。这种协商一致将使我们能够本着镇定沉着的态度来处理议程项目 3 所包括的问题, 这种态度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就有所欠缺。

因此, 如果我在你主持协商期间发表的意见在你看来似乎是“特殊的先决条件”, 我愿你把它归因于语言的不准确, 而不是西方国家集团或我个人的意图。我想这些话会有助于你继续进行我认为正在积极进行的协商。对我个人来说, 我将一如既往继续本着取得圆满结果的愿望参加这次协商。

主席: 感谢比利时代表的发言, 我注意到印度代表要求发言。现在请杜贝大使发言。

杜贝先生 (印度): 我很高兴尊敬的比利时代表决定本着非常建设性和合作的精神回答我今天上午发言中提出的几个问题, 同时也说明了西方国家集团的立场。我特别高兴地听说西方国家集团确实准备以认真和诚恳的态度对待审议议程项目 3 的问题。

我今天上午的发言并不是怀疑他们在本质上是否认真和诚恳, 不过是分析一下实行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建议会有什么后果。尊敬的比利时代表指出, 如果我们真想本着建设性精神对待这一议题并真想取得进展, 那么在非正式小组中所讨论的一些观点就不应带到全体会议上来。对此我不敢苟同, 但问题是我在全体会议的发言中谈到的内容完全是根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和正式提交的提案讲的。我至少可以引证六篇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其中尊敬的西方国家代表指出他们在审议该议题前想得到一个工作计划, 我们在全体会议上也有一份文件, 提出什么问题可以列入工作计划。我所要提出的只是我国代表团的很不成熟的判断, 即如果这种工作计划要事先得到讨论和制定, 那就绝没有希望就该议题达成协议以进行认真的讨论了。我不仅是根据文件中所提建议的性质这样说的。我可以花半个小时来分析这一文件, 但我不愿

(主席, 席尔瓦)

意这样作, 因为我感到这将不利于我们今后的建设性工作。但我要根据自己对该文件的估价, 以及我在各个小组进行谈判的经验, 确信这不是处理这一事务的最好方法, 因此我愿再次提出这一点。

我并不是说有人违背了已经作出的保证; 我现在说的是立场正在改变。我不愿作详细的阐述。我认为我在发言中已明确指出我们去年期待的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今年准备做什么、以及今年要求我们作那些额外的事。我不希望延长辩论, 我还是真诚地认为, 西方国家集团会放弃这一事先就行动纲领达成协议并把它作为就这个重要问题开始进行对话的先决条件的做法。

主席: 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还有其他代表团想要发言吗? 我请巴西代表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发言。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 主席先生, 请让我简单地表示我国代表团十分满意你主持我们的审议工作。并请接受我国代表团在你任职期间给予的充分合作。

今天上午我非常感兴趣地听取了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我的好朋友维沃达大使的发言。我在他的讲话中发现很多有趣的观点和想法。然而, 我必须对发言中的一种说法谈两点看法, 我将援引记录中的一段话: “上星期五我们终于设立了防止外空军事竞赛特设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 21 国集团并不认为给予该委员会的权限令人十分满意”。对此我有两点看法。第一, 我国代表团不知道 21 国集团发表过任何评价该权限的言论, 不管是认为很满意还是不太满意。第二, 作为 21 国集团的成员, 我国代表团认为权限是令人满意的。

主席: 感谢巴西代表的发言。还有哪一个代表团要发言?

没有了。现在我想宣布全体会议休会并在 5 分钟后召开原定于今天举行的非正式会议, 审议我今天上午在全体会议开始时所提到的问题。之后我们将恢复全体会议以正式确定我们可能在非正式会议上达成的任何协议。全体会议休会。

会议于下午 4 时零 5 分休会并于下午 4 时 10 分复会。

(主席)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第306次全体会议复会。

现在我们审议几份决定草案，内容是关于被邀请参加我们工作的几个非成员国提出要求参加根据议程项目5刚刚建立的特设委员会的问题。我们将按照秘书处收到这些决定草案的顺序逐一处理。

第一份是载于第CD/WP.174号<sup>1</sup>文件的决定草案，关于挪威提出的要求。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本会议通过该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我现在提出载于第CD/WP.175号、<sup>2</sup>176号、<sup>3</sup>177号、<sup>4</sup>178号、<sup>5</sup>179号、<sup>6</sup>和180号<sup>7</sup>等文件，关于芬兰、新西兰、丹麦、奥地利、

- 
- <sup>1</sup> 应挪威的请求(CD/552)并按照议事规则第33至第35条，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挪威代表参加1985年根据议程项目5设立的附属机构的会议。
  - <sup>2</sup> 应芬兰的请求(CD/553)并按照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芬兰代表参加1985年根据议程项目5设立的附属机构的会议。
  - <sup>3</sup> 应新西兰的请求(CD/554)并按照议事规则第33条至第35条，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新西兰代表参加1985年根据议程项目5设立的附属机构的会议。
  - <sup>4</sup> 应丹麦的请求(CD/555)并按照议事规则第33条至第35条，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丹麦代表参加1985年根据议程项目5设立的附属机构的会议。
  - <sup>5</sup> 应奥地利的请求(CD/557)并按照议事规则第33条至第35条，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奥地利代表参加1985年根据议程项目5设立的附属机构的会议。
  - <sup>6</sup> 应西班牙的请求(CD/560)并按照议事规则第33条至第35条，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西班牙代表参加1985年根据议程项目5设立的附属机构的会议。
  - <sup>7</sup> 应希腊的请求(CD/565)并按照议事规则第33条至第35条，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希腊代表参加1985年根据议程项目5设立的附属机构的会议。

(主席)

西班牙和希腊提出的要求，需分别作出决定。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本会议通过这些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最后是爱尔兰提出的要求。这是一个新的要求，因此，秘书处亦散发了有关的情况及决定草案。

爱尔兰要求参加全体会议以及关于项目4和5的附属机构。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载于第CD/WP.173,号<sup>o</sup>文件的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我现在向本会议提出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根据我在非正式会议上的观察，认为大家同意任命澳大利亚的R·巴特勒大使为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话，我将认为本会议同意对他的任命。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我请澳大利亚代表团向巴特勒大使转达我及本会议所有代表对他的任命表示祝贺。我相信他将非常有效地履行其重要职责，并祝他一切顺利。

秘书处今天已根据我的请求散发了一份关于本会议以及附属机构下周举行会议的时间表。该时间表是与各特设委员会主席商量制定的。大家知道，我们刚刚任命了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因此待他一回到日内瓦就请他通知我，准备在下星期什么时候召开特设委员会会议。一俟得到通知，秘书处将散发经修正的时间表同往常一样，时间表只是指示性的，如有必要，可以更改。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该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今天的工作到此为止。我现在宣布全体会议休会。鉴于星期二没有人登记发言，该会议将取消，而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在4月10日星期四上午

---

<sup>o</sup> 应爱尔兰的请求(CD/586)，并按照议事规则第33条至35条，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爱尔兰代表在1985年期间参加谈判会议的全体会议和根据议程项目4和5所设立的附属机构。

(主席)

10时30分举行。全体会议休会。

会议在下午4时15分结束。

×× ×× ×× ×× ××